

论美好生活的绿色之美

张三元

摘要：庚子之疫，突如其来，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崇尚绿色生活，行有所止、取之有度，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呈现出绿色之美的生活，才可能是美好生活。绿色生活是合乎人性的生活，是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在美好生活境域中，绿色生活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体图景。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绿色之美被欲望生活即欲望消费所遮蔽、消解。欲望生活制造生态灾难和人的物化，使美好生活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世界坍塌，从而成为制约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崇尚生态审美、重建生活逻辑、坚守“生态红线”，以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将人从欲望消费的旋涡中解救出来，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美好生活；绿色消费；生态审美；生活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项目编号：18AKS004）；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的新发展理念研究”（项目编号：18ZD024）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073-07

庚子之疫，突如其来，涉及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烈，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尽管疫情尚未结束，但人们已开始反思这次灾难的根源。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人类生活方式的消极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因素。在美好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之际，这场灾难无疑给人们以当头棒喝：美好生活必须是绿色的，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色。当人们的安全遭到威胁、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时，美好生活是根本不存在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 100 多年以前就给人发出了忠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美好生活时，也将环境之美、生态之美作为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强调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并没真正记取这些睿识智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是 SARS 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的肆虐横行，是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的疯狂反扑。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崇尚绿色生活，行有所止、取之有度，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绿色之美充分绽放的生活，才可能是美好生活。

一、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

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是指人的生活样态，即人怎样活着。狭义的生活是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讲的“生活”，即人们的“吃喝住穿”以及精神需要，当然，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这个意义上的生活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丰富和拓展。本文所讲的生活，主要是从狭义的意义讲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与广义的生活叠加，因为两种意义上的生活并非彼此完全不同，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美好生活是在“吃喝住穿”基础上的时代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倡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进入新时代，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因而，绿色生活主要是指人们对环境生态的要求，但又不局限于此。

“绿色”是一个隐喻，绿色生活泛指一切健康文明的生活。尽管健康文明的生活具有丰富内涵，可以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但归根到底指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合共生。

绿色生活是合乎人性的生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②，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人久居闹市，一旦走进大自然，绿色的葱郁、生命的蓬勃便走进内心，奔放但又烦躁的灵魂便有了安顿之处。所以，只要有绿色的地方，便意味着生命的充实与活力。因而，只有绿色生活，人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与美好。当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一种绿色之美浸润内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祥和与宁静：“坐在这片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此时鸟雀在四处啾啾，或是悄然无声地从我的屋前突飞而过，直到太阳照临我的西窗，直到远处的马路上传来旅行马车的辘辘声，才让在时光的流逝中如梦初醒。”^③这无疑是一种绿色生活，尽管这不是绿色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绿色生活的主要形式，却展示出绿色生活的基本维度：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管人们的生活内容如何丰富、生活方式如何变迁，但有一点是亘古不变的，即人类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生活。对此，马克思确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既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④。或者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⑤。绿色是自然界的本色——常新自新、充满活力、生机无限。因而只有绿色生活，才是既合乎自然本性、更合乎人性的生活。

绿色生活是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一直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甚至直接同一。“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是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中阐明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是推动生产发展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

力，人类要想“创造历史”，首先就是要生活，即满足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需要，于是，才有了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⑥，而“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⑦。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生活是根，具有本原性意义，没有生活就没有生产。

在新时代，供给端即生产端结构性改革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原因在于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而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归根结底，满足人们的需求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离开这个目的，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没有意义。从根本上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不断转型升级的生活需要。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不等于绿色生产，但绿色生产构成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或基本路径，而绿色生产又以绿色生活为基本前提。只有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才有现实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把生产归结到“生活方式”的范畴。显然，“粗陋的需要”只能导致“粗陋的生产”，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裂，只有绿色生活和绿色生产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才能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美好生活较之于“物质文化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美好生活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生活”，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使人真正成为“富有的人”。不管美好生活如何定义和发展，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绿色生活永远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一方面，尽管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但物质文化生活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文化生活当然是一种绿色生活，但文化生活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离开物质生活来谈文化生活，只是一些玄幻家的梦中呓喃。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物质生活需要都是第一位的，当人们的吃喝住穿在量和质上得不到满足时，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就是说，美好生活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物质生产构成美好生活实现的基本路径。没有“富起来”，就没有“强起来”；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因而，绿色生活离不开绿色生产，绿色生产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阔前景。

另一方面，只有在绿色生活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有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将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问题

放在首位。在这些利益问题之中，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没有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美好生活就是一个泡影。毫无疑问，只有绿色生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最安全、最健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之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⑧。

二、美好生活中绿色生活的总体图景

只有在美好生活中，绿色才能展现出丰盈而深刻之美，绿色生活才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⑨并凸显出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⑩一样，在人们还没有“富起来”之前，整天为温饱忧心，是看不到绿色之美的。只有在新时代，在已经“富起来”并正走向“强起来”的过程中，绿色之美才呈现在人们眼前，绿色生活才成为人们生活之必需。那么，在美好生活中，绿色生活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总体图景呢？或者说，美好生活中的“绿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绿色”、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美呢？

近些年，不少学者讨论从“浅绿”到“深绿”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追求的应该是“深绿”，而非生态现代化阶段的“浅绿”。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话题。“深绿”和“浅绿”是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提出的“深生态学”和“浅生态学”的形象表达。这个问题很复杂、很深邃，这里难以述说，只想以最直观的方式来表达它：“深绿”比“浅绿”好，就像人们刚接近原始森林时，眼前是一片“浅绿”，而一旦进入原始森林，则置身于“深绿”之中，那种惬意和舒畅是无以言表的。所以，“浅绿”代表的是人与自然的结合，而“深绿”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美好生活中的“绿色”，当然应该是“深绿”。“深绿”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之间的“谐趣图”：

简约有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约就是“节用”，即节俭、节制或取之有度之意，亦即墨子在《节用》篇中提倡的“不加者去之”“去无用之费”。所以，简约是一种美德，是人的一种格调和格局。“大道至简”，道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梭罗居住在瓦尔登湖期间，追求的正是一种简约生

活：“大多数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悠闲自在，不仅没有多大必要，而且对人类的发展实在是个阻碍。谈到奢侈与舒适这两个方面，最明智者往往过得比贫穷更加单纯和朴实。古代的哲学家们，有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和希腊的，都是同一格调的人物，他们的外在生活贫穷得无人可比，而内心生活的富有谁也难敌。”^⑪这是一种简约的丰富，或丰富的简约。简约不是贫穷的代名词，相反，却正是富有的表现：不图数量，追求质量。马克思所讲的“富有的人”，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简约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相反，越是追求奢侈和繁复，越体现出一种生活质量的“粗陋”——物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贫穷使人呈现出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人的“节用”，意味着一种“他在性”，即为自然界“减负”：自然界尽管富有，足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但绝对满足不了人无休止的贪欲。因此，“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⑫。“轻轻地”是一种诗意的表达——精致和浪漫成为简约的内在意蕴。“诗意地栖居”，绝不在于繁复，而在于简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简约生活看作是一种诗意的、艺术的、审美的生存方式。

绿色低碳。简约有度即绿色低碳，绿色低碳包括简约有度，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者主要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行为方式。态度决定行动，行动体现为结果。低碳是一个技术概念，是指较低或更低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因而，低碳生活是一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低能量、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绿色低碳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保护，减少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节能减排是绿色低碳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又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象征，即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文化条件，或如理查德·罗宾斯所言，“所有的动物都会把他们的环境变成生存的条件，但是人类除此之外还会把他们的环境变成文化条件。也就是说，人们会根据文化来选择食物种类、生产工具和产品，并建设和安排栖身之处”^⑬。这是理解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重要视域，其中包含着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两个基本维度。低碳生产提供低碳产品，低碳消费则体现在购买、使用和废弃的整个过程都要遵循节能减排的原则。因此，绿色低碳是一种价值取向，即践行生态环境责任，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展现为一种行为之美，但这种行为之美不只是

外在的，而是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

敬畏友善。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在西方生态伦理学家那里，平等是考量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主张众生平等。尽管这种思想是对以自然为予取予求对象思想的一种超越，但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平等，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自然是生命之母，当然也是人类之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之基。马克思多次指认，人来自于自然界；二是“人类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在地球上人类最终会消亡，并且不留下丝毫的痕迹，而伟大的自然仍处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中”^⑭。尽管这种观点颇具悲观情绪，但事实的确如此。因此，对待自然，要敬畏。当然，敬畏不是害怕、恐惧，而是尊敬、尊重。习近平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就体现出对平等思想的包含与超越。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要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要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或者说，人是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份子。因此，人类对待自然要敬爱、尊重、友善，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人始终是主动的方面，对自然充满爱，自然也会回馈以友善，造福于人类。“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⑮，这一当代深层生态学的行动纲领，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纲领，否则，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便会接踵而至。

和谐共生。这是绿色之美的高度凝结和集中呈现，是简约有度、绿色低碳、敬畏友善的必然结果和当然表征。以前，人们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一是人通过劳动，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将自己的意识作用于自然，从而使人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⑯，实现人的发展；二是人“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在改变自身自然的同时，也“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⑰，使自然人化，从而实现自然的发展。尽管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怎么也抹杀不掉“天人二分”的痕迹。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不同，它超越了“天人二分”，以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为最高准则，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其着力点是和谐。和谐不是同一，而是以差异和矛盾为前提的“合一”。正是因为有矛盾和差异，才存在和谐，才需要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都是和谐的具体体现。只有和谐，才有共生。在生命共同体中，人和自然只有和谐才能共

生。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实际上，“美丽中国”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三、欲望生活从根本上消解绿色之美

迄今为止，美好生活仍然是一种愿景，尽管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但毕竟还是“应然”而非“实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在路上。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还不是一种绿色生活，离人与自然的“谐趣图”还有很远的距离。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把与绿色生活相反的生活称之为“粗陋生活”“虚假生活”“利己生活”，但窃以为，“欲望生活”更能体现当下的生活境遇。欲望生活包括欲望生产和欲望消费，但主要是指后者，即消费主义。欲望生活的根源、本质及其全部特征可概括为两个字：欲望。欲望生活既是利己的，也是虚假的，更是野蛮的，它从根本上遮蔽、消解绿色之美，从而制约着美好生活的实现。

消费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被贝尔、费瑟斯通等人指证为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⑱，“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⑲，追求欲望的满足，将快乐看作人生的唯一目的。人是有需求的，既有生理需求，也有发展渴望，“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求，而是欲求。欲望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欲望驱使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满足”，从而“也是对资源的不计后果的浪费”^⑳。因此，欲望消费是一种以满足欲望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破坏”或“破坏性创造”能力。森林锐减、土地贫瘠、空气污染、水污染，“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㉑，从而导致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及其后果的揭示，都以对资本主义欲望生活方式的把握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㉒

欲望生活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生态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理应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浪潮的裹挟，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乘虚而入，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相勾连，使人陷入欲望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生态红线”屡屡被践踏，生态危机已不再是杞人忧天，而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欲望生活是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杀手”，而且，它往往打着“提高生活水平”“满足生活需要”的幌子，具有“隐形”特征，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和杀伤力。

欲望生活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是满足一己之私欲的德性及行为，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公有地的悲剧”的出现。“公有地的悲剧”是加勒特·哈丁提出来的，意思是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私利而贪得无厌，最终导致公有环境的破坏。他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在一块对所有人开放的草地上，每个牧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竞相在上面喂养尽可能多的牛羊。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块草地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但都希望别人减少放养的数量，而自己却一只一只地增加。如此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因超载而导致草地崩溃。在严格的意义上，自然就是人类的公有地，因为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因国家以及地区的地理界限而分隔开来，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态危机之所以演变为一个全球问题，原因就在于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动不动就将制造全球生态危机的“帽子”扣在发展中国家头上，就是一群在“公有地”上撒野的“放牧人”。不只是在全球，在一个国家内也存在着这个问题。譬如，有人在环境优美之处，砍掉森林、毁掉绿地，盖起了宽大的别墅，甚至为自己盖起豪华的“阴宅”，而希望生活在拥挤窄小空间中的人们不去抢占公共资源。再譬如，有人任意地向自然环境排放有害气体、物质、污水，随意丢弃垃圾，把自然界当做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自留地”。这样，当一个人的德性随着公有地的消失而沉沦时，生活便成为满足一己之私欲的快感，而完全失去了美感。在这个意义上，美好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它既以德性为前提和表征，更以德性为基本内容。只有在人的德性充分展现并成为一种美好或至善时，美好生活才可能莅临。

欲望生活往往体现为一种野蛮行径，连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没有。尽管欲望消费可以从不同意义上理解，但口腹之欲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即是说，欲望消费，不管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一种口腹之欲的满足。这是对人性的亵渎。作为

自然之子，人与动物是一种共生、共患关系。一方面是共生。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对动物友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人对动物的关爱与照顾，可以看做是人对外情感的一种延伸。动物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可能使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因而，守护生态环境平衡是人类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共患。目前已发现的人类主要病原体有1000余种，其中60%以上源自于动物。据统计，近20多年来，新发和复发人类传染性疾病近70%来源于动物。人兽共患病已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提出“One Health 同一个健康”发展理念，倡导人类与动物及环境和谐相处。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捕食野生动物是最典型的例子。17年前的SARS病毒，就是由于捕食野生动物而招致的灾难。在本质上，这是人性的灾难。科学研究发现，SARS病毒根源于蝙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因与“福”同音，被人们视为吉祥、如意、幸福的象征，并将其与寿桃、灵芝、桂花、梅花、喜鹊等联系在一起，赋予其“五福临门”“福至心灵”“福增贵子”“福禄寿喜”等美好寓意。在英美文化中，蝙蝠则是吸血鬼的化身，象征着“嗜血”和“残忍”。在现实中，蝙蝠是自然界名符其实的“毒王”，寄生着4000余种病毒，每一种病毒传染到人身上，都足以招致灭顶之灾。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人对蝙蝠都应该敬而远之。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在网络上竟然还能看到丑恶到无以复加的人性：仍然有人在捕食蝙蝠。至于其它的动物，如果子狸、穿山甲、猴子、老鼠等等，早就被人端上餐桌，成为甘之如饴的美味。

总之，欲望生活必然带来两种灾难，即生态灾难和人的物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征服自然、满足欲望为生活乐趣，必然造成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制造正在将人类带入绝境的生态灾难。在这个过程中，人被物化逻辑所控制，其自主性及其主体性被欲望所吞噬，波德里亚的“物的包围”、卢卡奇的“物化意识”、马尔库塞的“单面人”正在成为现实。生态灾难抽掉了人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人的物化使人的德性、良知、人性泯灭，导致精神世界塌陷，如此一来，美好生活便因绿色之美的丧失而成为海市蜃楼。

四、以绿色之美彰显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生态危机在根本上是人的危机，是人的生存和

发展危机，它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危机又是人性的危机。摆脱生态危机，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达到两者和谐共生的境界，需要实现从欲望生活向绿色生活的转变，展现出生活的绿色之美。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根本还在于人。只有把人从欲望生活的旋涡中解救出来，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用绿色之美彰显美好生活的生机活力。

首先，提高人的素质，变革生态观念，崇尚绿色生活，让生态美学走进日常生活。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即文明素质。当然，文明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以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为支撑。因此，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伦理教育甚至美育等，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内容。没有这些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的文明素质集中体现在生态审美的养成上。生态审美即生态美学，是人对待自然态度的最高境界。可能有人认为，美、美学、审美属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距甚远，与日常生活并不搭界。其实，美就在生活之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是有一个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每个人都有自发的审美意识，问题在于如何将其激发出来并转化为一种自觉。自然界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即是一种审美自觉。当然，自然美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正如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所言，“在环绕着我们并且仇视着我们的自然中是没有美的”，而在已经“富起来”并正在走向“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眼中，自然之美必须逐步呈现出来，生态审美应该成为“富起来”的人们一种起码素质或标配。生态审美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发现并欣赏自然的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③。“艺术的对象”即是审美的对象。自然之美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内容，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对于植物，我们喜欢色彩的新鲜、茂盛和形状的多样，因为那显示着力量横溢的蓬勃的生命。凋萎的植物是不好的；缺少生命液的植物也是不好的。”^④二是自然之美作为人和人的生活暗示，

这在人看来才是美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或者，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⑤。这才是生态审美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毫无疑问，绿色生活即是自然对人的“暗示”，亦即一种生态审美的生活方式。

其次，丰富精神生活，培育绿色消费的价值自觉，重铸生活逻辑。欲望消费之所以盛行，除了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大众广告传媒的渲染等因素以外，人们精神上的贫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具有根本性。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活的贫困是欲望消费的总根子，其必然结果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逐。因此，将人从欲望消费的旋涡中解救出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是必须的、正确的道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价值取向，绿色消费蕴含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由人的精神世界所涵养、生成。因此，只有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才能养成绿色消费的价值自觉——由满足物欲转向发现价值。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重铸生活逻辑的过程。生活逻辑以价值逻辑为支撑，又展现出一种价值自觉。不同程度的价值自觉呈现出不同的生活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消费也是一种生活逻辑，它以资本逻辑为逻辑，以“物本”为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基本路径，因而需要提供一种新的生活逻辑，“这里所说的生活逻辑，是指在人的生存或‘更好的生存’中发现价值，在劳动生活和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人的生活的态度、方法。对人的生存来说好的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生活的逻辑也就必不可少地包含环境保全之意”^⑥。佐岩茂的这种理解，尽管不是针对美好生活而言的，但对铸造美好生活的生活逻辑是极为有益的。反过来讲，只有确立一种符合人类发展与自然万物繁茂生长相统一的价值自觉，承认并满足人们丰富性的合理需求，才能解放人、塑造人、发展人，从而实现人从“单面人”向“全面的人”“富有的人”的历史性跃升。

再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⑦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等都包含着生产生态产品的要求。关于生态产品，学界

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指无害性、可循环性的产品，如绿色食品、生态家居等，有人则将其理解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安全食品、宜人气候、舒适环境等等。这些理解都是正确的，但过于具体，一具体就容易挂一漏万。生态产品丰富多样、包罗万千，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因此，这里将其概括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万物繁茂生长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切产品。生态产品不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更体现为一种过程及其结果：生产过程及其结果、消费过程及其结果。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环节，具有总体性。只有总体性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品，才是生态产品，亦即绿色产品。生态产品是绿色之美的高度凝结和集中体现。毫无疑问，目前我国最稀缺的就是生态产品。譬如，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疫”中，人们反思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缺席。包括医疗卫生产品在内的所有生态产品都具有公共性，或者说，凡是生态产品都应该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可事实上，有不少医疗卫生机构已经被私人老板买断，变成私人机构了，这正是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缺席此次战“疫”的根本原因。因此，不仅要生产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而且要保证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即是说，生态产品理应由政府来制造和提供，或者由政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产品的供给。

最后，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筑牢“生态红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仅靠人们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在一定意义上，人的自觉是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结果。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这只是一个目标，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做一种总体性的考量，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达到同一个水平。事实上，尽管在总体上我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正在提高，绿色生活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但毋庸讳言，总有一些人突破、践踏“生态红线”。突破“生态红线”，必然造成对自然界的伤害，生态失衡不仅直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且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治理、环境治理实质上是对人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的治理，需要依法治理，将“任性”的人格和行为即所谓的“自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次新冠疫

情发生后，国家及地方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及时出台了一些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其实，在这方面，尽管我国的制度保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基本的法律法规并不少，问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执行。“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⑳这个要求必须得到坚决、彻底的贯彻执行，不能有丝毫折扣。对所有给自然造成破坏或伤害的人（包括组织、企业、个人等），都不仅要追责，还要彻底追责、终身追责，没有人可以例外。

注释：

①⑧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39、24页。

②④⑤⑥⑦⑨⑩⑪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209、161、519、520、185、192、225、161页。

③⑩ [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戴欢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页。

⑭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⑮ [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

⑯ 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⑰ 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⑱⑲⑳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8、587页。

㉑⑳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1页。

㉒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㉓⑳ [苏联]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10页。

㉔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

作者简介：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205。

（责任编辑 胡静）